

哲学僭越与诗的矫正：论阿里斯托芬《云》的戏剧批判

郭心月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戏剧化地呈现了一场思想冲突: 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使得斐狄庇得斯能为殴打父亲提供逻辑辩护。这一伦理颠覆, 直观揭示了“逻各斯”(logos)对雅典传统“密索斯”(mythos)秩序的威胁。该剧的批判矛头并非指向哲学本身, 而是指向一种脱离了城邦伦理根基的、被工具化的特定理性。剧作以火烧思想所为结局, 构成了诗对哲学僭越行为的一次矫正, 旨在为理性的运用重新划定边界。首先, 剧中苏格拉底的形象体现了一种对道德后果漠不关心的非审慎特性; 而作为新神的云, 则象征了此种逻各斯兼具修辞诱惑力与内在虚无性的双重本质。其次, 这种逻各斯的实践后果集中体现在斐狄庇得斯身上, 他为殴父张目、并声称能证明殴母正当性的逻辑, 暴露了新理性足以瓦解家庭(oikos)乃至城邦(polis)的最基本伦理关联。最终, 《云》的暴力结局并非反智主义的宣言, 而是对无根的逻各斯的矫正, 它揭示了逻各斯必须植根于密索斯的伦理土壤。

关键词: 阿里斯托芬; 云; 密索斯; 逻各斯; 诗与哲学之争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在公元前五世纪末的雅典,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城邦的每一个角落。正是在这一动荡不安的背景下,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于公元前423年在酒神节上首演。表面上, 它讲述了一个债台高筑的公民斯瑞西阿得斯, 试图将儿子斐狄庇得斯送入苏格拉底的“思想所”, 学习如何用言辞赖掉债务的滑稽故事。然而, 在这出喧闹的喜剧之下, 潜藏着一场更为深刻的文化寓言: 它是雅典城邦精神世界中, 新兴的“逻各斯”(logos, 在此特指以智者学派和自然哲学为代表的批判理性、工具性修辞术)与根深蒂固的“密索斯”(mythos, 即以神话、传统习俗、城邦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秩序)之间的一场激烈交锋。关于密索斯与逻各斯之争, 在本篇论文中, 可以认为是诗与哲学之争的另一种说法。¹

关于《云》的研究, 在国内相对较少且较为分散, 仅有《哲人与城邦正义——阿里斯托芬〈云〉浅析》等寥寥数篇; 一般研究常将其置入阿里斯托芬喜剧下, 首先, 有从政治谐剧角度切入的文章, 如《微茫正声: 阿里斯托芬的政治与哲学》《阿里斯托芬政治谐剧中的自然哲学》等; 其次, 也有专注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艺术手法与形式的, 如《“笑”的叙事与叙事的“笑”——论阿里斯托芬喜剧叙事的讽刺智慧》《阿里斯托芬: 鬼话、行话、笑话和疯话》等; 另外, 也有一些专著, 如《反讽及其理性——阿里斯托芬诗学研究》。

长期以来, 《云》被视为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乃至整个哲学界的误读与攻讦。然而, 阿里斯托芬的批判矛头并非指向哲学或理性本身, 而是针对一种特定形态的、脱离了城邦生活根基的逻各斯僭越。这一论述与杨冬晓的硕士论文《析〈云〉中的诗与哲学之争现象》有相近之处, 该文已敏锐地指出《云》是“诗与哲学之争”的重要体现, 并分析了剧中对苏格拉底作为自然哲学家与智者的双重批判。然而, 在此基础上, 本文力图在以下三个层面作出深化与推进: 首先, 在问题的界定上, 本文并非将《云》仅仅视为一场历史冲突的反映, 而是将其看作一次主动的、以诗学方式进行的矫正。其次, 在批判对象的界定上, 本文更为聚焦。本文认为, 阿里斯托芬的矛头并非笼统地指向哲学, 而是精准地指向一种脱离了城邦伦理根基、缺乏古希腊人所强调的“审慎”(phronesis)的特定哲学形态。本文将深入分析,

¹ 此观点见骆冬青:《论美学事件: 诗、史凝结的思》:“诗与哲学之争, 也就是密索斯与逻各斯之争。”

这种非审慎的逻各斯是如何在剧中通过苏格拉底的形象被具体呈现的。最后，在分析的重心上，本文更侧重于戏剧文本自身的运作机制。如果说既有研究多是透过戏剧去观察其背后的社会矛盾，那么本文的重心则在于分析《云》作为一部戏剧，其诗性矫正的具体表现方式。

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阿里斯托芬通过对苏格拉底、云神及父子伦理颠倒的讽刺性塑造，戏剧化地呈现了这种新兴逻各斯对城邦密索斯秩序的侵蚀性风险；并最终，他以诗人的身份，运用喜剧这一诗的独特形式，在火烧思想所的象征性结局中，完成了一场对哲学僭越的诗性审判与矫正。

为展开此论述，本文将首先追溯《云》诞生的历史语境，探讨战时雅典的文化氛围如何为逻各斯的崛起及其引发的争议提供了土壤。其次，本文将聚焦于剧中的核心形象——苏格拉底与云神，分析它们如何分别代表了逻各斯的实践源头与抽象象征。再次，本文将深入剖析以斐狄庇得斯毆父为高潮的戏剧冲突，揭示逻各斯与密索斯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最终，通过对戏剧结局的阐释，本文将总结阿里斯托芬如何通过诗的批判，为守护城邦的伦理边界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并探讨其对于思考当代理性困境的启示。

一、城邦危机与阿里斯托芬的戏剧策略

阿里斯托芬的《云》并非诞生于真空，而是雅典特定历史症候的产物。要理解其批判的指向性，必须首先了解其生长的社会土壤，即一个因战争与民主而经历文化剧变的雅典。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化，不仅消耗着雅典的物质国力，更深刻地动摇了其精神秩序。旷日持久的战争与突如其来的瘟疫，使得公民对传统神祇的信仰及其所承诺的城邦福祉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雅典的民主制度在战时进一步扩张，公民大会和法庭的权力达到顶峰。在这样一个大众政治时代，个体的命运与城邦的决策，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公开辩论中的说服能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可被学习、掌握并用以说服大众的修辞术的重要性，被推至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渴望在政坛上影响决策的政治新贵，还是希望在法庭上打赢官司的普通公民，都对这种能反败为胜的言说技术抱有强烈的需求。这为以传授修辞术闻名的智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催生了雅典社会一股强烈的逻各斯热潮。

然而，这种热潮也带来了深刻的文化焦虑。喜剧，作为雅典民主体制内一种被官方许可的、合法的政治批评机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焦虑。在万众狂欢的酒神节上，喜剧诗人被赋予了嘲讽权贵、针砭时弊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也有其边界，《云》在首演时的惨败，或许正暗示了阿里斯托芬的讽刺触及了民众内心深处某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他们既渴望逻各斯带来的力量，又恐惧其可能颠覆一切的后果。喜剧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其视角本质上反映了民众对那些智者与哲学家的复杂观感。

对于当时的普通雅典公民而言，游谈的智者与诘问的苏格拉底之间，界限是模糊的。他们都挑战传统观念，都围绕知识展开讨论，都吸引年轻人，并且似乎都对天上地下的所有事物抱有非同寻常的兴趣。这种将苏格拉底与智者混为一谈的公众印象，被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戏剧化并推向了极致。剧中，阿里斯托芬将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悬在篮子里思考、研究气象与昆虫、传授如何颠倒黑白的诡辩家，而《云》所塑造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个难以剥离的社会标签，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本人就曾极力将自己与阿里斯托芬剧中的形象区分开来：“他们虚假地指控我，让你们相信，说有个人名叫苏格拉底，是个有智慧的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钻研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较强。”

²足以体现阿里斯托芬《云》的影响之大，这表明阿里斯托芬的艺术创作并非孤立的讽刺，而是成功地迎合并固化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公众误解。苏格拉底在为自己生命做最后辩护时，必须首先面对几十年前一部戏剧投下的巨大阴影。

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集智者收费教学、自然哲学家无神论倾向与苏格拉底本人反思性追问于一身的。这种艺术加工并非源于无知，而是一种戏剧策略。阿里斯托芬的目的不在于绘制一幅精确的历史肖像，而在于提炼并夸张一种他所洞见的、共同的威胁性。

这种共同的威胁，正在于将逻各斯从其所嵌入的城邦生活与伦理规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种中立的、纯粹的、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的工具。无论苏格拉底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与智者的追求报酬有多大差异，在阿里斯托芬看来，他们向城邦呈现的过程与效果是相似的，即通过理性审视，动摇了未经反思的传统信念的根基。这种效果便是：通过一种外来的、需要专业训练的逻各斯，对普通公民世代相传的密索斯与习俗进行系统性质疑，从而悬置了其不证自明的权威；对于维系城邦日常伦理而言，一个以真理为名动摇家庭规范的哲学追问，和一个以胜诉为名颠覆城邦正义的修辞技术，其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同构的。因此，《云》中的苏格拉底形象，正是阿里斯托芬为了向全体公民警示这种逻各斯滥用的风险，而精心塑造的集大成者的批判靶子。

二、《云》中的形象分析：苏格拉底与云神

在廓清了《云》赖以生长的历史土壤后，我们有必要深入戏剧文本，审视阿里斯托芬究竟是如何将弥漫于雅典的文化焦虑，具象化为舞台上可感的艺术形象。剧作中的苏格拉底与作为新神的云，正是阿里斯托芬用以描摹逻各斯威胁的核心载体。前者是僭越的逻各斯的人间代理与教师，后者则是兼具不受约束的逻各斯本质的虚无缥缈（云）与密索斯的回归倾向（神）。

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并非历史的工笔描摹，而是诗人为那种新兴逻各斯所绘制的一幅批判性肖像。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种新知的强大诱惑力：它允诺了一种解放，一种将个体从传统密索斯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单凭理性便能审视乃至颠覆一切的权力。正是这种颠覆性，才使得思想所门庭若市。然而，阿里斯托芬紧接着便揭示了这种诱惑的致命代价。他批判的核心，正在于这种新兴逻各斯的非审慎特点。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论述，剧中的苏格拉底“缺乏审慎（*phronesis*，或译为实践智慧）他没有反思他自己所作所为的语境或条件：他缺乏自我认识。由于他缺乏审慎，他不能恰切地模仿生活；他是非诗艺的。”³这种非审慎的哲学姿态，其危险性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首先，是以自然主义祛魅传统神话。剧中，苏格拉底只承认“太空、云和舌头”，不信仰其他的神。⁴当无知的乡下人斯瑞西阿得斯要为宙斯的存在辩护时，苏格拉底只好承认还有高于云神的东西，但他坚决否认更高的东西是宙斯，他说那是以太般的漩涡；这是一种看似科学的自然主义解释。⁵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它不仅以一种机械论的宇宙观取代了人格化的神圣秩序，更关键在于，它剥离了自然现象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敬畏。传统密索斯中的宙斯不仅是自然力的主宰，更是城邦誓言与正义的终极担保人。苏格拉底的祛魅，在消除部分

²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I》，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³ [美]施特劳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李小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⁴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⁵ [美]施特劳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李小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迷信的同时，事实上也抽空了传统伦理的神圣根基，从而为之后斐狄庇得斯的道德虚无主义铺平了道路。

其次，是其教学行为中对教育者责任的彻底逃避。思想所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其招生标准却并非学生的品性或求知目的。苏格拉底对斯瑞西阿得斯只为赖账的动机不闻不问，欣然接收了这个学生。这深刻地讽刺了逻各斯被工具化、商业化的倾向：它不再是引导灵魂向善的技艺，而沦为一种可以出售的、服务于任何欲望的纯粹技术。苏格拉底对斐狄庇得斯学成后的可怕言行也表现出惊人的冷漠，这与柏拉图构想中那种关心学生灵魂福祉的爱智哲学家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他所代表的，正是一种缺乏审慎、无视知识传授之社会伦理后果的危险教育观。

最后，这种非审慎通过其身体与空间的象征得以具象地表现出来。苏格拉底并非脚踏实地地在城邦广场上与人对话，而是被一个吊筐吊在半空中，以便他可以从各个角度观看太阳，斯瑞西阿得斯理解为苏格拉底看低诸神，而苏格拉底没有反对。这一滑稽的场景，是阿里斯托芬对脱根哲学最直白的讽刺：它象征着一种悬置于现实生活之外、脱离城邦伦理土壤的抽象思辨。因此，思想所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意象：它是一个物理上脱离大地、思想上脱离社群、语言上脱离日常的封闭空间，是非审慎哲学自我隔离与自我繁殖的培养皿。

如果说苏格拉底是逻各斯的教师，那么本剧的真正主角，作为歌队的云神，则是逻各斯本身的神性化身与最深刻的象征。她们既是剧中苏格拉底崇拜的新神，也是阿里斯托芬实施其诗性批判的最终武器。

一方面，云神是修辞术与相对主义的完美象征。云的形态变幻莫测、无形无质，可以模仿万物，这恰恰对应了智者学派修辞术的核心特征：它可以为任何相互矛盾的立场辩护，缺乏恒定的价值内核。她们一开始这样对斯瑞西阿得斯说：“你这位想追求我们的大智慧的凡人啊，你会变作全雅典人里、全希腊人里最幸福的人……你得要相信最聪明的人便是最好的人，他能够同人家舌战，能够在法庭上和议院里辩论成功。”⁶之后，更是许诺称：“只要你崇拜我们，只要你会讨乖巧，你决不会失败的。”⁷在此意义上，云神代表了将逻各斯等同于善的危险倾向，以及逻各斯作为一种纯粹工具性力量的巨大诱惑力。

但另一方面，她们既是赋能者，也是反噬者，这揭示了工具理性的内在虚无。云神的话语中充满了对信徒的疏离与嘲讽，她们会转头对苏格拉底说：“这儿有一个人，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赶快把他舔吃了。”⁸从“最幸福的人”到可以被“舔吃”的猎物，这种称谓上的巨大落差，正是工具理性与使用者之间真实关系的写照：它从不关心使用者，只提供纯粹的效力。她们看似在帮助斯瑞西阿得斯，但最终却精准地导向了他家庭伦理的崩塌。这体现了阿里斯托芬对这种纯粹工具理性的深刻批判：一个只提供方法而不提供价值指引的逻各斯，最终反而会吞噬其使用者，因为它本身是空洞的。

在剧作中的插曲部分，云神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歌队长打破了戏剧幻象，直接以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口吻对观众说：“诸位观众，我当着养育我的酒神，很坦白地对你们说真话。我既然把你们当作很聪明的观众，更把这个剧本当作我的最好的喜剧，就让我得胜，让人家承认我很高明……我也是一个英雄诗人。”⁹在这一刻，云神不再是剧中那个暧昧的自然神，而

⁶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4 页。

⁷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5 页。

⁸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7 页。

⁹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7-178 页。

成了诗人本人意志的直接载体。阿里斯托芬通过她们的口，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严肃的、有道德关怀的、旨在教育城邦的诗人，他创作喜剧目的是引导“聪明的观众”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在戏剧中为阿里斯托芬本人和他的诗赋予了最高的道德权威性。如陈国强所言：“阿里斯托芬创作《云》……是基于内在理路上对苏格拉底的反对。所以阿里斯托芬的《云》对苏格拉底的反对，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认识问题。它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于苏格拉底哲学的批判，只不过它是以一位喜剧诗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¹⁰

正是这一元戏剧身份的确立，使得云神的最终转向显得顺理成章；这是诗人的意志回归并接管了戏剧的情节，集中体现了诗对逻各斯的矫正。当斐狄庇得斯的罪行达到顶峰时，这些一度代表着价值中立的云神，转变为道德审判官，并直言不讳地揭示真相：“我们每次看见一个想做坏事的人，总是这样对待他，直到我们把他毁了，叫他知道敬畏神明。”¹¹这一刻，云神完成了从逻各斯的象征向密索斯秩序维护者的回归。这标志着被逻各斯技术暂时压制的传统道德秩序的强力复苏。她们默许甚至推动了火烧思想所的净化仪式，完成了逻各斯的毁灭。阿里斯托芬利用了喜剧歌队的灵活性，让她们在不同层面穿梭自如。她们是剧中人眼里的新神，是观众耳中诗人的声音，也是整部戏剧里诗性正义的最终执行者。

通过这一安排，阿里斯托芬的批判不再是外在于戏剧的，而是内化为戏剧本身最核心的驱动力，从而将一部讽刺喜剧升华为一次自我意识明确的、诗对哲学的公开审判。

三、密索斯与逻各斯的戏剧张力

现在，我们进入戏剧的核心冲突，考察当这种被从密索斯中抽离出来的逻各斯被付诸实践时，它如何在城邦最基本的单元：家庭中引爆了一场毁灭性的伦理革命，并最终催生了一场来自诗的终极矫正。

阿里斯托芬高明地选择将这场宏大的思想冲突，浓缩于家庭这一微观场域。在古希腊观念中，家庭（oikos）是城邦（polis）的基石，父子关系则是维系社会秩序与传统传递的根本纽带，是密索斯与法度（nomos，或译为社会秩序）最稳固的体现。因此，对父子伦理的颠覆，就构成了对整个城邦秩序的直接攻击。斐狄庇得斯，这位曾经听话的儿子，从思想所学成归来后，成了逻各斯的完美学徒和密索斯的毁灭者。

这场毁灭的高潮，体现在他为殴打父亲所做的正当性辩护中。值得注意的是，斐狄庇得斯出于为欧里庇德斯辩护的目的同父亲吵起来，最终上升到殴父的局面，而后，他还要运用他从思想所学来的辩论术证明“儿子应该打爸爸”。首先，为父亲斯瑞西阿得斯所不齿的是欧里庇德斯戏剧中“欧里一个哥哥诱奸了他同母的妹妹”的戏词，斐狄庇得斯的辩护则体现了他在思想所学习之后，对于伦理问题的漠视。他声称“试看那些小鸡和旁的牲畜，它们尚且和父亲打架，鸡和人有什么分别呢？只不过它们不能够制定法律罢了”¹²，从而巧妙地挪用了智者学派关于自然（physis）与法度（nomos）的辩题，将人类社会基于历史、文化和神圣性的伦理规范，降格为一种可以被随意类比的自然现象。他论证说，既然制定法律者也是凡人，为何他就不能制定一条儿子也可以打父亲的新法律？

在此，逻各斯的破坏性本质暴露无遗：它将一切传统、一切神圣的不言自明之物，都置于怀疑主义的审视之下，并宣称唯有通过形式逻辑的辩护，事物才具有合法性。这是一种彻

页。

¹⁰ 陈国强：《反讽及其理性——阿里斯托芬诗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09 年版，第 35 页。

¹¹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9 页。

¹²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7 页。

底的价值颠覆。如果说殴打父亲已经是对社会秩序的致命一击，那么接下来斐狄庇得斯宣称他同样要像殴打父亲那样殴打母亲时，这场伦理革命便抵达了其最恐怖的终点。殴打母亲，意味着对自然本身——不可动摇的血缘、生育与生命本源——的根本的背叛。斐狄庇得斯正是剧中苏格拉底式逻各斯僭越教育后最骇人的成果。

另外，密索斯与逻各斯冲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阿里斯托芬揭示了逻各斯的祛魅努力，最终不过是导向了另一种形式的复魅。剧中，思想所中的哲人试图用闷灶的比喻来解释宇宙的奥秘，意在将世界去神秘化，如斯瑞西阿得斯第一次提到思想所时所言：“那儿居住的人彼此讨论，叫我们相信天体是一个闷灶，我们住在当中就像是木炭一样。”¹³然而，对于斯瑞西阿得斯和普通观众而言，这种怪异的科学解释，比宙斯神话更加难懂，更像是一种需要特殊开悟才能理解的黑话，所以斯瑞西阿得斯的重点并不在此，而在于后半句话：“只要你肯给钱，他们会教你辩论，不论有理无理，你都可以把官司打赢。”¹⁴

这精准地讽刺了一个悖论：一种意在驱散神话迷雾的理性语言，由于其抽象性、技术性和与日常经验的隔阂，反而自我塑造成了一种新的、排他性的新神秘。苏格拉底在民众眼中，也从一个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新式巫师。思想所由此成为新的神秘主义策源地。这说明，逻各斯并未真正驱散神秘，它只是用一种新的、同样需要信徒接受的语言，取代了旧神话，从而形成了新的知识暴政。

当逻各斯的破坏力被展现到极致，戏剧便走向了其必然的结局：矫正与净化。这场审判的发令者，正是此前态度暧昧的云神。她们最终的道德转向，宣告了密索斯秩序的强力回归。而执行者，则是被逻各斯愚弄并摧毁了家庭的直接受害者——斯瑞西阿得斯。他放火焚烧思想所的行动，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火在古希腊文化中，既是毁灭的力量，也是净化的力量。

作为惩罚与毁灭，这场大火是对带来混乱与灾难的源头：思想所及其代表的哲学倾向，最彻底的物理清除。这是一个来自受害公民的、充满愤怒的复仇，它宣告了当哲学自我封闭、无视其社会后果时，来自现实世界的反噬将是暴烈且不容置疑的。作为净化与更新，火烧掉了思想，象征着对被污染的城邦空间的一次礼仪性洗涤。它试图烧尽那些脱离根基的逻各斯，为戏剧世界内的伦理秩序的恢复创造条件。

最终，戏剧通过火烧思想所这一结局，构建了一场象征性的审判。这场审判的判词并非指向智识或理性本身，而是指向其僭越。文本所批判的，不是哲学，而是那种脱离了城邦生活、伦理责任与实践智慧的特定哲学形态。火烧思想所这一终极的诗性矫正，表明：在城邦的秩序中，逻各斯必须有其边界，它需要植根于密索斯的土壤，并时刻接受城邦集体情感、伦理直觉与想象力的公共审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暴力的矫正是在喜剧的狂欢氛围中完成的。喜剧通过夸张、滑稽乃至荒诞的手段，本身就构成了对哲学严肃姿态的解构。观众在笑声中目睹思想所的毁灭，其感受是复杂的：这既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又是一场近乎荒唐的闹剧。阿里斯托芬用喜剧这种形式本身，暗示了他对哲学僭越的矫正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密索斯式的；是一种源自地面常识而非悬在半空的狂欢式回击。

至此，阿里斯托芬完成了他的戏剧批判。他不仅呈现了逻各斯僭越的风险，更以诗人的名义，通过戏剧这一媒介，宣告了在理想的城邦生活中，诗与哲学之间不可或缺的张力与平衡。

¹³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3 页。

¹⁴ 同上。

结论

本文通过对阿里斯托芬《云》的文本与语境分析,力图证明这出古老的喜剧并非对哲学或理性的全盘否定,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以诗为媒介对特定形态逻各斯的戏剧批判。我们看到,阿里斯托芬通过塑造非审慎的苏格拉底形象、变幻虚无的云神以及最终走向伦理颠覆的斐狄庇得斯,深刻地揭示了一种脱离了城邦密索斯根基、被工具化的逻各斯所具有的侵蚀性风险。剧作最终以火烧思想所这一象征性的诗性审判作结,它并非呼唤蒙昧,而是在为逻各斯划定其应有的边界,宣告了任何试图僭越其位、妄图成为唯一绝对权威的理性,都将面临来自现实世界与传统伦理的激烈反抗。

由此,《云》的意义便超越了其时代。它成为西方思想史上诗与哲学之争一个独特而生动的早期样本。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诗人驱逐出城邦不同,阿里斯托芬的立场似乎更为复杂,他所展示的,并非诗与哲学的非此即彼,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共生关系。在他看来,城邦需要逻各斯的批判性反思来避免僵化,但逻各斯更需要密索斯所提供的价值土壤、伦理根基与社群归属感来避免自身沦为虚无的破坏性工具。诗,尤其是喜剧,则在这场永恒的博弈中扮演着守卫的角色;它用笑声、用恐惧、用大众的常识与直觉,不断地审视和矫正着哲学理性的僭越。

将目光投向我们身处的当下,阿里斯托芬的警示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今天,逻各斯的僭越已不再是雅典广场上的辩论,而是以更强大的形态——譬如技术理性、算法逻辑、资本效率——渗透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当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全面压倒,当植根于历史与传统的密索斯被视为进步的障碍而轻易抛弃时,我们同样面临着意义真空与伦理困境。

因此,重读《云》,我们获得的不仅是对一部文学经典的理解。它并非要我们熄灭理性的火焰,而是要我们永远警惕:当理性离开大地,被悬于半空时,它将不再带来光与热,而只剩下焚毁一切的危险。

参考文献:

- [1] 罗念生. 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2] 施特劳斯.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M]. 李小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 [3] 陈国强. 反讽及其理性——阿里斯托芬诗学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 2009.
- [4]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 I[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 [5] 罗森. 诗与哲学之争[M]. 张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 [6] 张奎志. 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 [7] 杨冬晓. 析《云》中的诗与哲学之争现象[D].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 [8] 崔嵬. 微茫正声:阿里斯托芬的政治与哲学[J]. 外国语文, 2019(03):26-32.
- [9] 曾艳兵. 阿里斯托芬的“元戏剧”[J]. 世界文化, 2016(09):31-33.
- [10] 胡稼. 阿里斯托芬政治谐剧中的自然哲学[J]. 学术月刊, 2016(05):21-26.
- [11] 张文涛. 哲人与城邦正义——阿里斯托芬《云》浅析[J]. 现代哲学, 2011(05):63-68.
- [12] 沈林. 阿里斯托芬:鬼话、行话、笑话和疯话[J]. 艺术评论, 2008(08):59-64.
- [13] 刘明厚. 阿里斯托芬与喜剧精神[J]. 戏剧文学, 2007(12):31-35.
- [14] 李志雄. “笑”的叙事与叙事的“笑”——论阿里斯托芬喜剧叙事的讽刺智慧[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06):36-43.
- [15] 骆冬青. 论美学事件:诗、史凝结的思[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04):200-206+244.

Philosophical Transgression and Poetic Correction: A Dramatic Critique in Aristophanes' *The Clouds*

Guo Xin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City, 450001)

Abstract: Aristophanes' comedy *The Clouds* dramatizes an intellectual conflict in which the Socratic "Thinkery" enables Pheidippides to provide a logical justification for beating his father. This ethical subversion vividly reveals the threat posed by logo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the Athenian mythos. The play's critique is directed not at philosophy itself, but at a specific, instrumentalized rationality that is divorced from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lis. The conclusion, in which the Thinkery is burned down, constitutes an act of poetic rectification for philosophy's transgression, aimed at re-establishing boundari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 First, the character of Socrates embodies an imprudent character indifferent to moral consequences; meanwhile, the Clouds, as new gods, symbolize the dual nature of this logos: its rhetorical allure and its intrinsic emptiness. Second,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this logos are epitomized by Pheidippides, whose logic—vindicating father-beating and claiming to justify mother-beating—exposes how this new rationality is sufficient to dissolve the most fundamental ethical bonds of the household (oikos) and the city-state (polis). Ultimately, the violent conclusion of *The Clouds* is not a manifesto of anti-intellectualism, but a correction of rootless logos, revealing that logos must be firmly rooted in the ethical soil of mythos.

Keywords: Aristophanes; *The Clouds*; Mythos; Logos; The Quarrel between Poetry and Philosophy